



「因我身屬軍人，刻在前線抗戰，萬一不幸以身殉職，完我軍人天職。」

——124師參謀長鄒紹孟

A8 ■責任編輯：曹思遠 ■版面設計：美術部 2015年9月1日(星期三) 香港文匯報 WEN WEI PO

國共合作統一戰線 延安成政治指導中心

1935年10月，陝北黃土高原秋風蕭瑟，寒氣逼人。一支衣衫襤褸、面黃肌瘦但精神昂揚的隊伍跨進了陝北蘇區的大門。這支由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率領的中央紅軍在經過二萬五千里的長途跋涉後，終於找到了「家」。而後的一年多，在瓦窯堡會議成功召開、「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中共中央得以進駐延安城。從此，延安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也成為敵後抗日戰爭的政治指導中心和敵後抗日根據地的總後方。從這裡點燃的星星之火最終形成燎原之勢，引領中國抗日戰爭取得了決定性勝利。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仕珍 延安報道

巍巍寶塔山，清清延河水，神秘的窯洞，高亢的信天游（即陝北民歌）……所有這些，勾畫出了人們心中的延安。延安革命紀念館館長張建儒告訴記者，當時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領導下，以延安為中心的陝甘寧邊區成為政治民主、經濟發展、軍事頑強的全國模範抗日根據地。而中共提出的全面抗戰和持久戰略理論，也成為領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思想武器，陝甘寧邊區和延安因此被譽為「抗日的燈塔」和「革命的聖地」。

瓦窯堡會議 發抗戰最強音

位於延安市子長縣的瓦窯堡革命舊址安靜地矗立着，20餘孔磚砌窯洞無聲訴說着抗戰時的歷史。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此召開了瓦窯堡會議。「當時正值民族危機加深的關鍵時刻，蔣介石仍堅持對日不抵抗政策，而瓦窯堡會議卻提出團結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共同抗日，發出了中華民族共同抗戰的最強音。」張建儒告訴記者，瓦窯堡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讓全國人民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有槍出槍，有知識出知識，使每一個愛國的中國人都參加到反日的戰線上去。「這就是黨的最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總路線。」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提出在廣大愛國人士中產生了強烈影響。1936年12月，國民黨張學良、楊虎城二人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並向全國發出了關於「救國八項主張」的通電。「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促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極大地鼓舞了中國人民的抗日熱情。



■瓦窯堡會議舊址外景。本報延安傳真

抗日總後方 星火終燎原

延安市黨史研究室副主任楊鈞告訴記者，由於所處的地理位置特殊，延安始終處於一個相對穩定的和平環境中，因此黨中央得以在這裡集中研究和解決中國革命發展過程中的一系列重大問題。「毛澤東在延安的窯洞裡先後寫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等112篇論著，就中國革命的政治路線、軍事、黨建等一系列重大問題進行探討研究，為中國革命的勝利指明了方向。」楊鈞說。

建敵後根據地 開闢新戰場

1937年7月，「七七事變」爆發，祖國山河淪陷，民族痛楚加深。8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市洛川縣召開洛川會議，確定全面抗戰路線、敵後持久抗戰的戰略任務和作戰方針，國共兩黨共禦外辱。而當國民黨正面戰場接連失敗時，中共卻以時間換取空間，大規模開展敵後根據地建設，有力地牽制了日本兵力。

張建儒告訴記者，抗日戰爭爆發後，日本把大片華北地區佔領了，但主要都是交通沿線比較方便的城市，而中共軍隊所處的地理位置相對偏僻，正好是日本勢力薄弱的地方，客觀上為根據地建設提供了發展空間。與此同時，根據地軍民的敵後武裝也給日本侵略以有力打擊。「儘管當時共產黨隊伍的武器裝備落後，但根據地軍民的一些非正規戰術卻讓日本人心神不寧，山地游擊戰、地道戰、地雷戰，防不勝防。」張建儒說，日本鬼子與國民黨在正面戰場交戰，共產黨在後方的破壞直接給日本後勤補給造成嚴重困難。「所以，當時日本鬼子對中共的抗日根據地恨之入骨，制定了殘忍的『三光』政策。」但他同時表示，這也說明敵後根據地的威力很大，對抗擊日本侵略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都是一個不可替代的貢獻。

八旬翁親歷日軍轟炸 痛失親人



■延安寶塔山。網上圖片



■82歲的折正千老人向記者講述日軍轟炸延安的歷史。記者張仕珍 攝



■愛國青年奔赴延安。記者張仕珍 翻拍

延安作為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和敵後抗日戰爭的政治指導中心，曾受到日軍的瘋狂轟炸。1938年到1941年，日軍累計對延安進行轟炸17次，死傷人數近500人，延安這座古老的山城幾乎成為廢墟。

82歲的折正千老人是個老延安，最近，他正在專心編着一本有關抗日戰爭的書籍——《寶塔山話卷》。1938年，當日本飛機第一次轟炸延安城時，時年5歲的他並不知嚴重，甚至還對飛機感到好奇。直到自己的一個表姐在轟炸中遇難，他才意識到日軍的可憎。

折正千回憶說，1938年11月20日，日本飛機第一次轟炸延安。當時他剛從被窩裡鑽出來，準備吃早飯。突然，二姐一把抱起他，跟着大人們倉惶往外跑，「滿街都是驚慌失措的人，娃娃哭，大人喊，亂成一鍋粥。」當時，折正千家的南院被扔了兩顆炸彈，「回到家後，看到鍋碗瓢盆全都被炸毀，母親一下子就癱坐在地上哭嚎起來。」

「那時候人們沒見過飛機，很多人還站起來看稀奇，直到飛機不停地『下』炸彈，大家才害怕了。」折正千說，黑煙滾滾塵土飛揚，大家被嚇得趴在地上直到飛機走後才敢站起來。

也就是在那次轟炸中，折正千的一個表姐被炸死，留下幾月大的兒子。「表姐的遇難讓我們非常痛心，我劉姨因為思念女兒哭壞了雙眼，也很透了日本鬼子，就將沒斷奶的外孫取名『抗戰』。」折正千告訴記者，抗戰一直不知道母親的容顏，這成了他的終生遺憾，去年，他帶着這個遺憾離開了人世。

進步思想影響兄長參加抗戰

「共產黨進延安後，帶來了進步風氣。當時在榆林工作的大哥和二哥受進步思想的影響，也積極參加到抗戰前線，保家衛國。」折正千說，當時他的兩個哥哥折金門和折金榜在綏德照了一張相片寄給家裡，成為留給家人的最後記憶。

一旁，折正千的老伴畢貴英告訴記者，當年她的哥哥也是上前線作戰，至今杳無音訊。「當時哥哥從韓城直接到西安，而家人則直接從韓城到了延安。哥哥離家的時候只有18歲，我相信他應該還活在這個世上。」

《論持久戰》堅定決心



■毛澤東在延安窯洞撰寫《論持久戰》。本報延安傳真

張建儒告訴記者，抗戰初期，國民黨在正面戰場上節節敗退，「速勝論」和「亡國論」甚囂塵上，全國人民對抗戰的前途充滿憂慮。為了澄清人民思想上的混亂，堅定抗戰的決心，1938年，毛澤東在延安抗戰研究會上了幾次《論持久戰》的長篇講演。他指出，日本的

侵略戰爭是退步的、野蠻的，中國的反侵略戰爭是進步的、正義的；日本是一個小國，經不起長期戰爭，而中國是一個大國，能夠支持長期戰爭；日本失道寡助，中國能獲得世界上廣泛的支持與同情。因此，中國不會亡，最後勝利是中國的；中國也不能速勝，抗日戰爭是持久戰。

海外發行獲高度評價

之後，《論持久戰》演講稿在根據地和國統區相繼出版，並在國內外引起了積極反響。「當時白崇禧讀完《論持久戰》後，就向蔣介石推薦。在蔣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論持久戰》的精神概括為『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同時，以國民黨軍委會的名義通令全國，把《論持久戰》作為全國抗戰的指導思想。」張建儒告訴記者，《論持久戰》還被翻譯成英文向海外發行，同樣得到高度評價。



■延安市黨史研究室副主任楊鈞。記者張仕珍 攝



■人們通過大生產運動，渡過經濟難關。記者張仕珍 翻拍

民心所向 抗戰必勝

抗日戰爭時期，地處陝北小山坳裡的延安城，就像一縷星星之火，最終形成燎原之勢，引領了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究其原因，延安市黨史研究室副主任楊鈞認為，以延安為中心的陝甘寧邊區革命根據地，在當時是一個經濟、軍事、民主建設的模範，而中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則成為其勝利的必然因素。

他指出，陝甘寧邊區當時在全國眾多根據地乃至世界上的影響是最大的。「首先是革命戰爭的堅強堡壘。」楊鈞稱，陝甘寧邊區擔負着抗戰和保衛總後方的雙重任務，因此，邊區首先加強了軍事建設，在宜川至神府一線幾百里河防保衛戰中，邊區軍民戮力同心，一一擊退敵人進攻，使日軍始終未能越過黃河一步。

同時，以延安為中心的陝甘寧邊區是第一個實行民主的區域。「民主選舉一方面讓人民獲得了民主自由，革命和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另一方面，政府真正成為為人民辦事的機關，實行廉潔政治，受到人民擁護。」楊鈞說，也正是這樣，在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中，人們才有空前的積極性，一同渡過經濟難關。

他告訴記者，延安時期，中共中央的決策始終圍繞老百姓，代表廣大勞苦大眾的利益，因而使中共領導的抗戰隊伍不斷壯大。「抗日戰爭時期，兵民乃勝利的最大資本。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則是贏取民心，最終奪取勝利的決定性因素。」楊鈞說。

